

李联海 著
马庆忠



一代天骄

孙中山传记(下)

29.506

一代天骄

孙中山传记（下）

· 李联海 马庆忠著 · 重庆出版社 ·

责任编辑：张德尚

封面设计：邵大维

一代天骄——孙中山传记（下）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77千
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250

书号：11114·103

定价：2.15元

目 录

第十九章	讨袁·····	(1)
第二十章	东渡的悲欢·····	(38)
第二十一章	再次讨袁·····	(67)
第二十二章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102)
第二十三章	在探索中前进·····	(122)
第二十四章	南征北伐·····	(145)
第二十五章	“祸患生于肘腋”·····	(176)
第二十六章	国共合作·····	(220)
第二十七章	手造黄埔军校·····	(263)
第二十八章	平定广州商团叛乱·····	(281)
第二十九章	“和平，奋斗，救中国！”·····	(297)
孙中山生平事业年表·····		(320)
参考书目·····		(347)
后记·····		(358)

第十九章

讨 袁

1912年2月15日，太阳刚刚露出脸来，孙中山便匆匆命令部队赶赴钟山明孝陵。

外交总长王宠惠对此莫名其妙，便问孙中山：“这是干什么？”

孙中山说：“祭明太祖。”

王宠惠吁了口气，提醒孙中山：“今天是参议院选举临时大总统的日子，孙先生或许必须出席，改日祭祀，怎样？”

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翌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天，参议院将进行投票。

孙中山知道王宠惠还不明白自己的用意，就说：“正因为今天是参议院选举临时大总统的日子，我才命令部队去告祭明太祖。”

“为什么？”王宠惠不由瞪大了眼睛。

“今天选举的事，听说军中有持异议的人，他们既不愿我辞职，又不满意袁世凯。我恐怕他们在选举时候有所表示。如果选举袁世凯一案不通过，人们必然会怀疑我嗾使军队维持个人地位，所以特地移师城外，使他们不能干预选举的事。”

王宠惠这才明白过来，又吁了一口气。

其实，为让位袁世凯的事，孙中山一直处于矛盾和苦恼之中。

1911年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的光复各省都督府代表

会议上，已经作出袁世凯如果反正，即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

12月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开始，“收拾大局，非袁莫属”的妥协声浪，更是铺天盖地而来。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印象并不好，觉得此人“狡猾善变”，“可能迟滞革命行动”，甚至认为他是个“巨奸大憨”，把政权让给他是靠不住的。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坚持民主、共和的原则。当袁世凯一度表示反对共和，主张君主立宪，以至中断谈判，企图迫使南方革命势力作更大让步的时候，他毫不退让，下令出师北伐，而且在安徽、河南、湖北战场上，取得了一些胜利。

可是，南京临时政府军事力量薄弱，财政困难，以至连陆军总长黄兴，也不由发出这样的哀鸣：“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以谢天下。”

南京临时政府曾经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它们却不管一词，只是催促孙中山尽快与袁世凯妥协。

不仅如此，连颇得孙中山器重和信赖的汪精卫也指责起孙中山来了。他一面发表宣言，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纳妾，不吸烟，不饮酒”的“五不”主义，故作姿态地力争广东都督不就；一面指责孙中山有权欲思想，当面斥责孙中山：“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孙中山无力改变“过渡”政府和“过渡”总统的局面。所以，他说：“我……及至抵达国境，一切都已发展到了使我认为明智莫过于承认既成事实的阶段。”1912年1月2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孙中山在无奈之下，对袁世凯这个“汉人”还抱有幻想，以为他“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企

图利用他，“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

当狡猾的袁世凯向南京临时政府虚伪地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公认”，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时候，孙中山便马上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他终于拿出了装有国玺的红袋，庄重地交给了临时参议院院长。

一位西方史学家这样评论孙中山的辞职：“一个人在通缉逃亡中过了多年疲惫的生活，一旦尝到了权位的甜头，依照常理，他是否会实行其诺言呢？……他履行了诺言。……他的高尚道德能使他贯彻此一自愿引退的目的。这种高尚的人格，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其实，孙中山在民主、共和问题上，是决不拿原则作交易的。至于总统的职位，他却放眼世界，抱着“天下为公”的信念，视总统为国民公仆，从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禁脔。

在任职期间，孙中山常常听见人们向他高呼：“大总统万岁！”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总统府就对秘书说：“封建专制已经推翻，但还是有人呼喊‘万岁’，很不适当。”

秘书见孙中山这样认真，便又向他报告：“各省都督发来的电文，好几份也有‘恭祝大总统万寿无疆’的词句。”

孙中山听罢，摇摇头，严肃说道：“封建流毒真深！必须继续肃清！我们已经革除了帝制，难道还要做皇帝吗？对那些祝我‘万寿无疆’的，你们应劝导几句。以后如果再是这样，就把原件退回！”

1912年4月3日，孙中山由唐绍仪陪同，以一个国民的身份离开南京，循着他前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路，回到上海。

20日，孙中山乘坐“联鲸”号军舰到福建考察。舰泊马尾，

福建都督孙道仁上船迎接，请孙中山换坐甲板船到南台登岸。

孙中山一见到孙道仁，便不高兴地说：“刚才江面小船有‘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纸旗，太不象话了，是你布置搞的吗？共和国的总统卸任就是平民了，怎么还可以继续称总统？至于‘万岁’二字，本是封建专制皇帝强迫手下臣民这样称他的。我们革命的先烈为了反抗‘万岁’，抛弃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鲜血？我如果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先烈？请你马上通知大家取消这些纸旗，如果不取消，我不能熟视无睹，只好不下船了。”

孙道仁连忙道歉，马上让人通知把那些纸旗都改写为“欢迎孙中山先生”。

这样，孙中山才高高兴兴坐上甲板船进城。

孙中山在福建考察完毕后，继续南下，来到了广东，回到了阔别十七年的故乡。

早在学生时代，孙中山就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现在，孙中山作为前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回来，乡亲们自然感到无比自豪，纷纷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翠亨村呈现出一派欢乐的气氛。

孙中山亲手栽种的酸子树苗虽说枝叶婆娑，长成大树了，但翠亨村的民众依然糠菜度日，贫困如故。孙中山心里十分不安。大家看见孙中山回来了，不免都有些奢望，纷纷要求孙中山拨公款修缮祠堂，兴建道路，创办学校。

以天下为己任的孙中山，对乡亲们的要求，只是微笑着回答：“易的，易的，你们尽管自己动手去做。”他向乡亲们解释：现在国家百废待举，财政困难，要想把家乡搞好，还得靠大家出力。

孙中山没有搞光宗耀祖、衣锦荣归那一套，他和乡亲们布服叙旧，闲话桑梓，回家三天，演说三次。直到临别那天，才摆了十桌简便酒菜，请乡亲父老吃了一顿饭，便又踏上新的征途。

解职以后，孙中山追求的是什么呢？

他在解职词中表示自己“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各国民之力量，与四万万人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

那时候，他认为清帝退位，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努力的即在此事。”

为此，从解职之日起，他便以民国国民的身份，兴致勃勃地周游湖北、福建、广东各省，宣传民生主义，鼓吹社会革命，提倡振兴实业，为新中国开创一个新局面，“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

6月22日，孙中山回到上海，集中精力与黄兴悉心规划铁路建设。他认为：振兴中国的唯一方法，是振兴实业，交通为实业之母，而铁路又是交通之母；要振兴实业，必须从修造铁道入手。他打算十年之内，修造铁道20万里。“此事告成，则中国虽有一千兆之外债，亦不患无力偿还了。”6月27日，他在给咸马里夫人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信心：“我相信并且希望在不久之后，每一件事情都会再一次顺利发展下去。我想尽可能避开政治方面的事情，我要尽我的力量来发展本国的自然资源，特别是铁路的建设，我希望我能够完成这些事情。”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后，继续执行清朝政府的媚外卖国的政策，民族危机更进一步加深。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孙中山所期望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都是行不通的。在当时，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把政权让给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

不错，孙中山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以自代的时候，为了防

范袁世凯背叛共和国，特别附带了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一、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一、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可是，历史上的巨奸大憨愚弄正直的贤者是不乏其例的。何况，那时候，利令智昏的袁世凯已经把孙中山放在眼里了。

1912年2月27日，孙中山派遣迎袁专使蔡元培、欢迎员宋教仁、汪精卫等人抵达北京，欢迎袁世凯到南京就任。袁世凯命令城内外商铺悬挂五色旗，车站支搭松柏牌楼，打开正阳门^①迎接专使。当天下午，蔡元培一行由唐绍仪陪同谒见袁世凯，呈递临时参议院通告文和孙中山手书。蔡元培说：“大总统必须南行，以联络南北感情，藉巡视军民近状，表示融洽。”

袁世凯当然不肯离开他的老巢北京到南京去受约束，但他却满脸是笑：“我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的人，即可就道。我非但要到南京，还计划赴武汉，与黎副总统晤商一切。”

袁世凯装模作样地与陆军统制、民政首领协商留守人员，甚至连南下的具体路线也作了研究。

忠厚的蔡元培以为袁世凯遵从临时参议院决议，很是高兴，却没想到袁世凯的另一手动作。

早在专使到达北京之前，袁世凯就指使爪牙，盗用民间团体的名义，纷纷发表谈话，通电，致函，声嘶力竭地叫嚷“袁君不能离京”。

这还不够。29日晚7时许，曹锟第三镇陆军两营在北京发动兵变。东城和前门一带，火焰熏天，枪声隆隆，专使招待所首当其冲，变兵吵吵嚷嚷，骂声不绝，持枪破门而入，将他们的行李、文件洗劫一空。蔡元培一行眼看不对路，却又和袁世凯联络不上，

急忙爬墙逃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保定、天津的北洋军也相继哗变，假戏真做，趁机大肆掠劫百姓一番。

这时候，袁世凯的爪牙又放出空气了：“袁总统尚未离京，已经闹到这个样子，若真离去，恐酿大变。”

其实，兵变不过是由袁世凯一手导演的丑剧。事后，唐绍仪泄露了“天机”：“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錕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

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外交使团和袁世凯配合得非常默契。他们借口“兵变”，让各国士兵700多人在北京街头列队巡行，给袁世凯助威、鼓劲。日、英、美、法、俄、德等国，还纷纷从旅顺、香港、哈尔滨、青岛调遣军队入京“护卫”。他们的报刊连篇累牍刊发“专电”，宣称“各国公使均以襄助袁世凯为平乱之惟一妙法”，“深望南京政府许袁世凯在北京履任”，“今设不即组织共和政府，各国便将干涉”。

有了洋人撑腰，北洋军将领便向南京临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

副总统黎元洪也站出来说话了：“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

蔡元培惊魂初定，一时拿不出主意来。还是汪精卫首先开口：“今天的问题，应当首先实现统一，成立全国统一政府，才能安定大局。其余一切问题，都不妨尽量迁就。”蔡元培不知是计，连忙致电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提议改变临时政府的地点，取

消袁世凯南下的要求，准许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以挽救垂危的大局。

孙中山即使明白这次兵变的内幕，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一筹莫展，只得再次让步了。

3月6日，软弱的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统一政府组织办法六条：“一、由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受职。一、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示。一、参议院接到宣示之后，即复电认为受职，并通告全国。一、袁总统既受职后，即将拟派国务总理及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一、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受政府交代事宜。一、孙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前清外务部公署内宣誓就职。蔡元培代表临时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致答词说：“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

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啊！可是，礼毕之后，袁世凯一转过身来，就眉飞色舞地对一个亲信说道：“我五十三岁了，今日做的实在是狂妄的举动。”说罢，狂笑不已。

这样，几经艰苦奋斗得来的革命成果，国家的最高权力，被袁世凯攫夺去了。

也许，历史本身是一个严酷的实体，并不单单由善良的人们谱写而成。

其实，孙中山的辞职是时势造成的，正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指出：“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

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何待言！”

袁世凯就职以后，马上推荐唐绍仪^②为国务总理。唐是袁世凯的老朋友、外交上的得力助手，既代表袁世凯参加了南北议和，又征得袁世凯同意加入了同盟会。袁世凯推荐这个“双栖人物”，无疑是既可靠，又不致被临时参议院否决。

临时参议院自然同意由唐绍仪组阁。3月30日，袁世凯任命陆征祥为外交总长，赵秉钧为内务总长，熊希龄为理财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宋教仁为农林总长，陈其美为工商总长，唐绍仪兼任交通总长。

这个“混合内阁”，外交、内务、陆军、海军四个部都掌握在袁世凯手里，财政部也掌握在拥护他的立宪派手中。同盟会虽然掌握了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部，但都是摆设性的“冷衙门”。唐绍仪内阁实际上是袁家天下。

出乎袁世凯意料之外，国务总理唐绍仪并不完全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唐绍仪是一个醉心西方民主的官僚，认为《临时约法》既然规定内阁制，内阁便有权处理国家事务，不必事事请示总统。他又以南北之间的桥梁自居，推行袁世凯的政策，总得考虑同盟会的向背。这自然引起了袁世凯的猜忌。北洋派的文臣武将，也经常俯在袁世凯的耳旁嘀咕：“唐绍仪跟孙文都是广东人，又加入了同盟会，他现在完全倾向同盟会，不再是倾向总统了。”一天，唐绍仪到总统府汇报工作。袁世凯听罢，突然神色不悦，闷声闷气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唐绍仪大吃一惊，明白袁世凯对他存有芥蒂了。

王芝祥事件迫使唐绍仪不得不弃官出走。王芝祥是靠近同盟会的军人，曾在南京充当留守府军事顾问。唐绍仪组阁时候，曾经与同盟会达成口头协议，让王芝祥任直隶总督。袁世凯也点头同意。唐绍仪便打电报叫王芝祥到北京等候任命。可是，王芝祥到北京谒见袁世凯，袁世凯对他可以称誉不绝，请吃饭，聘为高等顾问，就是不提任命直隶总督的事。

唐绍仪找袁世凯商量。袁世凯说：“王系革命党人，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们还有余地么？”

“前既答应，现在怎能食言？”唐绍仪不晓得，袁世凯以前点头同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目的是骗取同盟会答应让唐绍仪组阁。

现在，袁世凯认为组阁的目的达到了，便说：“是你答应的，我并未预闻。”

袁世凯对老朋友也是如此狡诈，唐绍仪不由生气了：“这是责任内阁职权，我要发表。”

“我不盖印，能生效么？”袁世凯笑咪咪地反问。

袁世凯指使直隶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王芝祥任直隶总督。接着，袁世凯又借口军队反对，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让他回南方“宣慰”军队，而且，竟单方面宣布了任命状。

《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为最高权力机关，而国务院负实际责任，“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袁世凯发出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任命状，既是违法，更是不把总理放在眼内。唐绍仪勃然大怒：“袁竟不和我商议，便自行任命官吏。我这内阁还算什么责任内阁呢？不如早走为是。”6月15日，他留下辞职呈文，不经告别，就乘火车到天津去了。

唐绍仪的出走，正中袁世凯下怀。17日，袁世凯马上任命外

交总长陆征祥暂行代理国务总理事务，另组内阁。

袁世凯的倒阁风波，激起了同盟会部分会员的愤慨。同盟会的四位阁员也向袁世凯提出辞呈。袁世凯假惺惺地向他们说道：

“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蔡元培比过去清醒多了，针锋相对，用尖锐的口气回答他：“元培亦作为四万万人的代表而辞职！”好些同盟会员更看出袁世凯的本来面目，主张“二次革命”。他们说：“我们用热血换得来的江山，不能任其断送在这个野心家之手！我们要再来一次革命，打倒这个独夫！”但大多数同盟会议员对袁世凯的违法行为，漠然视之，只求在下届内阁人选上予以补救。6月20日下午，他们派出四位代表去见袁世凯，申述对组织新内阁的意见：“此次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著著进行，实因党派混杂，意见不一致的缘故。……此后欲图进展，非采取完全政党内阁不可。因此，同盟会的意见认为，第二次内阁只有两种：一、超然内阁，一、政党内阁。如果仍然采取混合内阁，同盟会会员不再加入。”

袁世凯反对政党内阁，坚持采取混合内阁，以便操纵。他色厉内荏，反咬一口：“我以前退居林下，何等安闲，这次出山，冒着艰险，负担重任，实为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尽的义务。我的宗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我都引为同志。否则，我亦不能强人所难。……”接着，袁世凯又用武力威胁议员，逼使议员通过陆征祥内阁阁员名单。这个所谓“超然内阁”，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傀儡。

袁世凯一方面加强对中央的控制，一方面利用各种借口，削弱南方各省都督的实力，打击革命力量。老奸巨猾的独裁者深知，要行这着棋，决非轻而易举。他决定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最后一举歼灭革命力量。

终于，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张振武案。

张振武是发动武昌起义的重要人物，湖北军政府成立，任军务部副部长。他反对黎元洪解散同盟会的军队、排斥革命党人。黎元洪下令解散张振武领导的将校团^③，张振武“函阻将校团不得退伍”。黎元洪企图遣散兵站总监兵六大队，张振武闻讯，立即将它改编为护卫队。黎元洪下令解散护卫队，张振武“抗不遵命”。

黎元洪知道张振武颇“得鄂军士心”，生怕他“留鄂鼓乱”。他低着头，阴沉着脸，眼睛不停地眨动着。突然，他眉头一皱，决定向袁世凯求助，好除去心腹之患。

袁世凯手里捏着黎元洪的电报，坐在椅上默默沉思。他知道这是黎元洪的借刀杀人计，一时不知如何处置才好。袁世凯反复地权衡利弊、得失，好一会，他才微微笑着，决定不露声色，将计就计，诡称有重要军务商讨，电令张振武入京。

张振武不知是计，懵懵懂懂到了北京。一连数日，北洋军大将冯国璋、段祺瑞轮流设宴招待，亲切异常。淮军宿将姜桂题更发起召开南北袍泽大会，大大庆贺一番。袁世凯也装作礼贤下士，不惜拐着那条跛腿，亲自在公府设宴接待，而且，气氛非常融洽。

黎元洪见北京毫无动静，不觉满腹狐疑，8月13日，又给袁世凯发了一个急电，催促从速下手：“张振武……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

袁世凯拿到这份急电，觉得时机这才真正到来了。

15日晚8时，张振武兴高采烈地在六国饭店宴请姜桂题、段芝贵等一大批北方将士。可宴会刚刚结束，张振武乘马车走到栅栏门，却立刻被包围逮捕，早已在那里等待的一辆大车把他押送到军政执法处。

在这前一个小时，张振武的同伴方维也在金台馆被捕，押送

到了军政执法处。

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将军令递给张振武、方维阅看。张振武不明就里，看过两遍，还是茫然地说道：“这电文恐怕是捏造的吧！”

方维仿佛是有恃无恐，自信得很，看过军令，还是朗声说道：“想让我们死去，还早着呢！”

翌日凌晨1时，张振武、方维却被枪毙了。当日，京师步军统领宣布张、方的“罪状”，把黎元洪打来的密电照录出来。

这是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公开杀害“革命元勋”的第一桩大血案。

大血案的消息传开，各界人士纷纷议论：“昨为座上客，今作刀下鬼，北京城的政治气候变动得多么快呀！”

在北京的同盟会参议员连忙提出质问案：“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本院有保护人民生命之天职，心滋疑虑，无可缄默，不能不一探其究竟也。”

在上海的黄兴也致电质问袁世凯：“南中闻张振武枪毙，颇深骇怪！……未见司法裁判，颇难释此疑问。乞更明白宣布，以解群惑，共和幸甚。”

袁世凯振振有词地说：“张振武一案，黎副总统原电有‘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乞立予正法’等语。黎副总统为鄂军督帅，对其所部宣布罪状，请正典刑，自应即予照办。至原案颠末，已电黎副总统明白宣布矣。”

张振武、方维的血迹还未抹干，袁世凯马上下令以大将礼安葬。给张、方两人的遗属各发抚恤金3千元，将被捕的湖北将校团团员全部释放，各给1千元回籍旅费。

这种花招，又蒙骗了不少人。

奸雄的捣鬼术是可以得逞一时的。张振武的流血事件还不能